

# 擅动亿元资金委托理财致巨亏 天大前校长严重失职被罢人大代表

□本报记者 丁昌 阮奇

昨日,本报记者获悉,21日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天津大学前校长单平,其事发与违规委托理财并导致巨大亏损有关。

21日,天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投票表决,罢免了单平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单平同志在担任天津大学校长期间,存在严重失职错误,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

## 事起委托理财

记者从天津大学有关人士处了解到,单平出事与违规委托理财有关。

天津当地某券商也向记者证实了此事,天津大学确实对券商进行了委托理财。据该券商内部人士表示,天津大学的小部分资金分仓委托给天津当地某券商,而大部分资金则分仓给深圳某券商。

据了解,2000年9月至2001年8月,单平擅自与深圳某公司签订《委托资金管理协议》,将学校1亿元资金分三批交给该公司,用于在股票二级市场进行运作。

该公司收到学校资金并购买股票后,将所购股票用于质押融资。2003年下半年质押的股票被相关证券公司陆续强行平仓,款

项被划走。截至目前,天大到账资金仅23467万元,该校1亿资本金损失至少3758.83万元。

## 现身多只股票

记者早前从一些券商处获悉,天津大学在委托理财中主要买卖的股票品种是新钢钒(000629),而记者随后搜索公开资料发现,新钢钒只是冰山一角,天津大学还买卖了其他大量股票。

根据F10资料显示,大商股份(600694)2004年半年报显示,天津大学持有其197万股,为公司第7大流通股股东。

新钢钒2005年公布的半年报显示,天津大学持有流通股4818万股,为其第2大流通股股东。时至今年,天津大学仍然在某些股票上“现身”。

海特高新(002023)今年一季度报告表示,天津大学一季度买入25.82万股,位居流通股中第9大股东,为当季新购入股票。

风神股份(600469)今年三季报显示,截至9月30日,天津大学持有其79.45万股,较第二季度增持了48.45万股,位居流通股股东第10位。

## 留党察看两年

日前,天津大学召开了校党委委员会、纪委委员的扩大会议,宣布了有关部门的决定——给予单平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建

## 单平简历

单平,男,汉族,1946年5月生,辽宁鞍山人,198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天津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3.09—1968.12	天津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学习;
1968.12—1970.03	天津市塘沽盐场六分场劳动锻炼;
1970.03—1978.09	天津铁厂修建部工长、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1978.09—1981.03	天津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攻读工学硕士研究生;
1981.03—1988.04	天津大学机械系教师
1988.04—1992.09	天津大学机械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
1992.09—1993.02	天津大学助教长;
1993.02—1994.09	天津大学教务长;
1994.09—1997.01	天津大学副校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主任
1997.01—1997.06	天津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主任;
1997.06—2000.02	天津大学校长、党委常委;
2000年2月	任天津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党委常委。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1年	国务院学位办、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
1993年	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来自津报网)

议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撤销其天津市人大常委会职务。

该扩大会议透出的信息显示,单平在委托资金管理的考察论证、协议审核、资金监管等一系列环节中,轻信他人,没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最终造成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失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把本应由集体决定的重大事项变为个人决断。

会议同时传达了有关部门的精神,要求各高校要切实加强对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监管工作,确保国有资产安全;要了解专业知识,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提高在经济活动中防范风险的能力。

## 天津大学平静如常

今年7月14日,单平的职

位由清华大学原副校长龚克接替,对外宣称的原因是年龄原因。单平1946年出生,今年正好60岁。

对于单平事件,天津大学的一位教师对记者表示:“学校里对单平的离开没什么大的反应,自从新校长来了后,学校一直都很平稳。”

(相关评论见 A14)

## 关注房地产

# 个人合作建房上海难仿温州

相关人士称,上海出让土地面积大、总价高,依靠集资竞买方式难以作为

□本报记者 唐文祺

一度在各地风起云涌的“个人合作集资建房”浪潮,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率先在温州“破冰”,而北京的发起人于凌碧也在众多支持者力挺之下锁定了意向地块。

“上海不可能单纯复制温州或是北京的操作方式,毕竟地域性、市场表现都有所不同。”昨天,上海首倡合作定制建房的“上海家园”发起人之一朱剑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虽然上海的个人集资建房不像温州、北京等地有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但是已有两、三块地进入视野范围,“正在洽谈之中。”

朱剑坦率表示,在上海房地产市场操作个人集资建房“的确有点难度”,因为上海的出让土地面积大、总价高;加之系列调控政策出台之后,市场观望气氛表现浓郁,因此单纯依靠集资竞买土地的方式难以作为。而温州的成功经验同样有其局限性,具备业内人脉的“牵头人”是重要影响因素。“目前虽然有许多上海中

小开发商手中的土地愿意出让,但地理位置稍好些的,开发商对于土地价值均有较高预期,不愿意以低价转让;价格合理的,地段又不好,这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意义。”

今年8月份,“上海家园”的宝山计划被披露,当时的消息称,“上海家园”与上海宝山区的一家开发商达成合作意向,建成之后的房价会比周边商品房均价至少低1000元/平方米,但是该项目最后却以失败告终。朱剑认为,由于房价涨幅的公开化,使得开发商感受到不小压力,这无意中也会对个人集资建房造成了阻力。“可能我们会尽量寻找不具可比性的地块进行选择。”他说,“等待本身也是一种投资。”

近期,由温州市市场营销协会发起的个人集资建房破冰,委托的房地产开发商竞得政府挂牌出让的25亩土地,对合作建房者无疑是加注了一剂“强心针”。北京的于凌碧也宣布,北京国土局土地交易市场即将入市的海淀区花园路25号居住用地成为意向目



上海个人合作集资建房负责人表示,已有两、三块地进入视野范围,并正在洽谈中 资料图

标,消息一经传出,北京合作建房报名处已聚集有140多人,集资金额达2000万元,初步具备竞拍土地资格。

但是业内人士指出,个人集资建房过程中牵涉到的拿地资格、资金管理、建设成本

等问题还不是主要因素。从客观条件来看,上海土地市场公开出让的土地以大面积供应为主,类似温州模式的小面积用地几乎不可能出现。同时,也有人担心个人集资建房暴露出了最为讳言的房地产成

本问题,会受到来自于多方面不同利益集团的抵触——虽然采取过各种折衷方式,如团购、与开发商合作建房等,但最后总是不了了之。从长远来看,个人集资建房能否真正成功,还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 温州个案催生合作建房联盟

专家提示,温州具备“家族式”投资传统,但个案不能消除潜在风险

□本报记者 于兵兵

受温州集资合作建房者成功拿地推动,包括广州、武汉、沈阳、温州、惠州及深圳等7个城市加入的全国合作建房联盟也将于本月底宣告成立。昨天,联盟筹备人之一的温州合作建房发起人赵智强向上海证券报表示,“联盟”仅为松散性质的组织,不存在制度障碍,温州首块集资建房用地也已进入拿地后的正常运作阶段。

但是专家提醒,温州合作建房项目后续操作还有众多问题有待观察,而且温州模式有其“市场文化”的特殊性,并不完全代表市场主流的方向。“市场如此热衷个人集资的合作建房,根本考虑是为了降低购房成本,缓解高房价的

压力。但是,买房绝不止价格成本一个问题,合作建房的管理成本、专业性风险是投资者必须考虑的问题,也决定了这一模式不可能成为市场主流。”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倪志刚表示。

对此事件的进展,房地产界人士均表示密切关注,但是提醒消费者不要因个案启动而对个人集资建房模式给予过高期望。“项目运作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不是一般的消费者能够掌控和规避的。”倪志刚介绍。

据了解,此次成功拿地的温州个人集资建房已经突破松散的个人联合方式,借助了社团组织和开发商的力量。发起人赵智强为温州市场营销协会秘书长,受温州260个会员委托,该协会负责代理集资建房

事宜。资金总集结额超过1亿元。同时,由温州市市场营销协会与温州瑞安市正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代建协议”,由后者以1.0458亿元价格,在土地招拍挂市场上取得温州龙湾蒲州街道“江前三产安置地块”的开发权。

“这种代建模式已经不是完全意义的个人集资建房行为,而是类似一种房地产私募基金的开发投资。”倪志刚表示。专家介绍,这种模式的最大风险是信誉危机:在260个投资者不能全部参与项目决策的前提下,负责人的管理信誉就是问题之一。温州市场具有“家族式”投资的传统,投资者相关信誉度较高,产生投资合作纠纷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但移植到其它市场就可能成为重要的风险之一。

## 热点

时间紧张 依据不足 知情有限

# 政协委员提高提案质量有“三大难”

□新华社电

记者从22日举行的全国政协提案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调研时间太短、对相关政策法规依据认识不够、对非自身专业问题了解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政协委员提高提案质量的主要因素。

据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傅杰介绍,近年来,政协提案数量逐年增加,但提案建议笼统、重复提交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提案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要处理好提案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既要广开言路,充分尊重和保护提案者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又要坚持以质量求发展,始终把提高提案质量作为提案工作的立足点。”傅杰说。

在北京市政协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44%的政协委员认为,自己提出提案的最大困难是没有调研时间,35%的委员希望政协组织能为他们提供政策法规依

据,48%的委员希望政协组织帮助他们进行调研或请专家对他们的提案进行论证。有关负责人表示,提高提案质量应该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委员克服他们在工作遇到的困难。

民盟中央有关负责人则提出,虽然各党派成员中有不少专家学者,但他们大多从事学术和具体业务工作,从掌握的有限信息资源中,很难从宏观上全面了解党和老百姓当前最重视什么、关心什么,即使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也很难提出超越政府所作工作范围的见解。

针对以上问题傅杰表示:“提案工作要在认真总结交流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特点、新情况,研究提出加强和改进提案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他同时指出,今后,提案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并使政协委员通过学习研究进一步提高综合反映重要信息的能力。

## 农发行串案:

# 深圳一公司老总涉嫌单位行贿受贿

□新华社电

农发行腐败系列案中的又一名行贿人22日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深圳贝斯特机械电子有限公司现年51岁的董事长谭伟基被检方指控涉嫌单位行贿罪。

在法庭上,检方指控:谭伟基为承揽北京美禾电子有限公司为农发行购置点钞机业务,与负责该项目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原副行长于大路结识。1997年3月,1998年11月和2000年12月,谭伟基以深圳贝斯特机械电子有限公司名义,分别与美禾公司、农发行签订点钞机购销合同。为了感谢于大路从中帮助,谭伟基于1999年初,给予于大路人民币30万元。

2003年于大路落马,调查期间谭伟基被于大路供述出来,并于2004年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此案将择日宣判。

## 中国音像协会副会长王化鹏表示

# 卡拉OK收费标准适合我国国情

□据新华社电

针对目前备受社会关注的卡拉OK收费问题,中国音像协会副会长王化鹏就收费标准是否合理合法,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上报的卡拉OK使用费标准,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费用)。”但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相关评论见 A14)

和协商。而在公告前的征求意见阶段,也充分听取了使用者或者代表的意见。他认为,目前的收费标准比较适合我国国情。

国家版权局11月9日发布公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上报的卡拉OK使用费标准,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费用)。”但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相关评论见 A14)

## 地区

# 西部城市无缘“中国制造业10强”

□本报记者 徐虞利

昨日,记者从亚洲制造业论坛秘书处获悉,在该论坛“2006中国制造业10大最具竞争力城市奖”评比中,西部城市与此无缘,入围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胶东半岛,东北老工业城市长春、沈阳、大连也入围。

据悉,本次评奖体系,由亚洲制造业论坛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按照国际通行法则,通过对科技竞争力、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等20多个指标分析,以此判定各个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专家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

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差距比较明显。长春、沈阳、大连与无锡、南京、杭州、佛山、东莞比较,工业总产值差距在1倍多。之所以能够入围,是因为东北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基地,是我国工业的发祥地,工业总产值均在2000亿元以上。而西部城市成都、西安虽然近几年发展速度转快,但是总量还很低,普遍在1000多亿。今年入围“中国制造业10大最具竞争力城市”的最低标准是2000亿的地级、副省级城市,西部还有很多省份全省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到2000亿,东西部的差距就落在工业上。

# 上海“准地王”只招全球500强

中国本土开发商可与500强企业联合竞标

□本报记者 李和裕

2号公告土地尚在挂牌,上海今年3号公告推出的17幅土地已进入到出让阶段。日前,上海房地资源管理局公布了3号公告土地的挂牌出让文件。记者发现,这次土地出让对开发商的资质和资金实力也提出了不少要求,如大热门普陀真如地块就只把目光瞄向世界500强企业。

位于普陀区重点建设的真如城市副中心的A3-A6地块,一经推出就被业内认定为此次土地出让的“地王”。

普陀房地局对这幅地的竞买人提出“独立竞买人或联合竞买人中至少一家必须是世界500

强企业(以2006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名单为准)或其控股子公司,且该企业必须占联合竞买投资比例50%及以上”的要求。同时,有意竞买的企业在挂牌报名截止日前10天内的银行存款应在人民币15亿元及以上。

“上海市中心可供出让的土地越来越少,这些地块受到关注是必然的。由于可开发的规模较大,而大盘往往在运作上对开发商的要求较高,因此政府在土地出让时也会考虑这一点。”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东)副院长陈晟表示,“而且热门地块定价较高并不与调控矛盾,相反可使土地回归应有的价值。”